

杏儿红了

打小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的老家不在这座城市，我父亲干革命来到这座城市，在这座城市里娶了我的母亲，所以就有了我们的家。

我老家在南方的乡下，很遥远。小的时候，有月光的夜晚，奶奶总要指着南方那颗最亮最亮的星告诉我，我的老家就在那星的底下，那星的底下，我的爷爷还在那儿留下了一幢房子，那房子，好大好大，比我们的窝要大许多。小的时候，我们家不像现在这样住楼，住小平房，奶奶总是把我们住的房子叫窝：“你老家的房子才叫房子呢，那房子斗拱飞檐，屋角上盘踞着独角兽，那四周回廊，那做回廊的木柱是当年你爷爷雇了船，跑几天几宿的水路才运回来，那么粗，那么直……”我想象不出“那么粗、那么直”是多粗、多直，就问奶奶：“文化宫的柱子也赶不上吗？”奶奶说：“文化宫的柱子也赶不上！”我的心一下子就飞了起来：我老家是有美丽甘蔗林的地方，空气中流动的都是快乐的歌声，豌豆像紫色的蝴蝶含着碧玉静静地停在绿叶上。

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，奶奶领着我回了一趟老家，我们乘火

车到南京，再从南京换汽车到一个小县城，又从小县城换汽车。出县城，跑十几分钟的柏油路，汽车就拐进一条乡间的沙石道，一股沙尘紧紧地咬住车屁股，不声不响地跟车赛跑，就像浪涛紧紧咬住乘风破浪的船。后来沙尘终于把车落在后面——我们的车停了，停在一个叫做“松桂”的小村庄——这就是我们的老家。

当着许多来迎接我们的乡亲面，我奶奶突然泪如滂沱，我看见西边翠竹掩映间露出一抹黛色的瓦，那种青黛，决然不同于周围人家的屋顶。我从公路上飞快地跑下来，通往翠竹掩映间的那条小土路，弄得我一双新球鞋像风尘仆仆的客。

我站到我的老屋面前了。它又矮又胖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拿它跟奶奶无数次描述的那幢房子相比，屋子的窗户是那么、那么的小，房间里黑乎乎的，一推门，一只小老鼠瞪着贼溜溜的眼，箭一般地从我脚边飞走了；房子分东西两厢，中间天井，苔藓悄然无声地在水井里疯长；至于那回廊的柱子，不过坛口粗，还赶不上门前那两棵杏树。可是住几天我就喜欢这里了，我喜欢乡下我的二叔，入夜了，二叔一边敲着小鼓，一边娓娓地说着从前的故事；我喜欢老屋的门，那门用整块木板做成，有一寸多厚，我双手把住门闩，把脚往上缩，然后往左右倾身子，门轴便快乐地“咯呀，咯呀”叫着；我喜欢门前那两棵杏树，那结出来的杏，酸里透着甜，奶奶和我晚回了一个月，树上的杏没有了，不过还有满树的叶子，还有粗壮的树干，我爬到树干上，有一只小虫，样子有点像蝗，可是脖子却很细，我逮住它，它屈起两只前脚，向我作揖求饶，许多年后，那可爱的样子还在我脑海里飘呀飘着……

我的故事却要从二十年后的公元二〇〇一年开始，这一天，四月的阳光很强劲地射到老屋的瓦上，瓦缝间稀稀落落的几棵寸

把长的草，迎着阳光倔强地生长着。

二叔睡到半晌才爬起来。其实，二叔没有睡懒觉的习惯。昨晚大叔给二叔来了一个电话，大叔说他已经退休了，要回来住一阵，一来呢，住在城里心里闹得慌，二来呢，“你一个人过日子，我跟你说说话”。四十多年前，大叔从老屋里走出来，投身革命的洪流，后来在离家很近的小城工作，这期间，除了我奶奶回来的那次，大叔偶尔因为工作的关系回来，从没在老屋住过一宿。昨晚二叔躺在床上，琢磨来琢磨去，也琢磨不出“这山人葫芦里装的什么药”，翻过来，覆过去，五十八岁的人竟一夜没睡着。

二叔半晌爬起来，洗漱完毕，然后“咯呀”一声，把门拉开了，门外的阳光迫不及待地朝他扑面拥来。二叔眯了眯眼睛朝门前看看，门前庄子里已有几个五六岁的小家伙在转来转去了。杏花落后，他们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游乐场，杏树底下好乘凉，而树上杏儿青青的，也让他们心旌摇荡。按说现在的条件好了，花点钱一年四季什么时令的水果买不到？可这些小家伙，香蕉扒了皮儿咬半口，哈密瓜吃一片丢半边，正儿八经买来的东西，吃起来不香，而青青的杏儿，咬一口能把下巴酸掉，可偏偏让他们得馋痲。

昨晚大叔在电话里还对二叔说，今年他又有时间了，杏儿红了的时候要摘一些送我奶奶，“小孩都是人来疯，你大人要有个大人样，要是成天和小孩在一起疯疯癫癫，那些青杏还不都被糟蹋了，拿什么送给妈，得武，你可记住，别像去年啊！”

二叔心里想：兄长脾气还似旧般，但还是唯唯诺诺地把电话挂了。二叔是说书艺人，听奶奶说，早些年，我们老家那儿说书艺人有许多许多，光我们村庄就有四个，后来许多人都改行了，我们村庄现在只剩下我二叔一个人。为什么独独他没有改行呢，

奶奶说，那是因为我二叔说书说得太好了，别的艺人说书都赶不上他。农闲的时候，二叔就会携一面小鼓，走村串户表演，自己现在不种田了。

来我们家，二叔更会说上几段，记得有一回说传统相声，说的是《江南围》，说乾隆皇上跟刘墉在茶馆里喝茶，听见附近有蛤蟆在叫，就想和刘墉开玩笑，问那边儿什么东西喧哗，刘墉说是学生读书呢。乾隆说，那你去把学生找来吧。刘墉走到河边儿，蛤蟆一见人，全跳进水里了。刘墉心想：这怎么办？正着急时，看见有只王八在岸上杂草中爬，就给抓回来了。皇上说，我找学生问话，你怎么拿王八来了。刘墉说：“启奏万岁爷，学生放假回家了，我把老师给您带来了。”二叔的声音好听，最后一句话“启奏万岁爷……”从二叔的嘴里出来，你听的却是“七奏万细爷……”二叔的声音拖得长长的，仿佛香炉的烟在你的头上盘着旋儿。我们一家人都乐开了怀，我奶奶更差点儿笑岔了气。我奶奶说：“得武的口才，那刘宝瑞说起来也未必赶得上呢！”

那回，大叔也在，奶奶对大叔说：“得文啊，妈的话你忘了么，有合适的女人家，还帮得武张罗一个。”大叔一听就急眼，大叔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妈，你问得武，替他张罗几个了？现在正道是种田经商，得武走村串户卖唱，人家一听，妈你说有谁会看上他？”奶奶说：“什么叫走村串户卖唱的呢，得武多好啊，你看看这……”二叔说：“别人看不上我，我还看不上别人呢！反正我一个人自在惯了，光棍好，光棍好，一人吃了全家饱……”“话不能这么说，二弟，有合适的还是考虑一个，”我妈妈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，“要不这样吧，你就留在我们家，白天我给你联系我们单位文化艺术中心说评书，你的条件可以呢，你往那儿一

站说评书，没准就有许多人看上了。”奶奶一拍大腿，说：“是啊，我家得武往那儿一站，没准明儿就是明星了，能行么？你和你们同志先说说。”“行什么行啊，”大叔又一本正经地说，“就得武说的那方言？也就我们一家人能听懂！”

二叔没有结婚，却极喜欢小孩。他眯了眯眼睛，朝门前看看，想起了昨晚大叔的话，故意朝门前板起脸：“呸！都回去，天天、婷婷、还有兵兵，今天这里禁场，你们都回去。”二叔长得又高又瘦，奶奶说他是猴相，虽怒不威，一板脸，更有趣。那个六岁的小婷婷就跑过来，小鸟似的问个不休：“二爷爷，什么叫禁场呀？为什么今天这里禁场呀？为什么让我们都回去呀？”二叔说：“禁场哪，就是说今儿这儿不许小孩子玩，闲杂人等不可停留啊。”“二爷爷，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，”叫天天的小男孩说：“你给我们讲个故事，听完了，我们就不在这儿玩了，这儿一点都不好玩，对吧，兵兵？二爷爷，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。”“那行，”我二叔说，“你们说话可要算数哦，不许反悔，拉钩……今儿讲什么呢，我想想，想想……”

一张躺椅放到杏树底下，二叔有时站着，有时又坐到躺椅上眉飞色舞地讲故事，而听故事的未必个个聚精会神。叫兵兵的小男孩得了好动症，已经瞅好时机，悄悄地爬到杏树上了，弄得一个一个的青杏“扑簌簌”地落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大叔回来了，大叔威风凛凛地从城里回来了。

大叔是个做官的，小时候，奶奶常常对我说：“你大叔身穿公安服，要多威风就多威风，全局的人就数他能耐。有一回，出了一个贼，盗窃的，来无影、去无踪，公安局长伤透了脑筋，也

奈何不了他，后来没办法了，想到你大叔，是你大叔才把那贼抓住的，你大叔呀，打小的时候就能耐……”那时候我不明白大叔是如何抓住来无影、去无踪的贼的，反正大叔后来当上治安股长了。在奶奶的嘴里股长是个好大好大的官，连县长都得听他的，县长没有枪啊。长大后，我才知道在我们老家那座小城里，公安局长只是正科，不像我们这座城市，最小的官就是科长了，就是处长也多如牛毛。我妈妈在单位不争名、不求利，临到退休的时候，职务后面居然也多了一个括号——（副厅级）。

这位公安局股长两个月前退休了。冷不丁地一退休，大叔一时真的适应不了，闲、闲、闲到家里啥也不会干。那退休前夕的欢送会上，新股长那么真诚地举起酒杯，那么真诚地说，今后工作中不明白的地方要向老股长请教。说实在的，大叔当时真就没把这话放心上。但是，退休了两个月，“请教”的电话没响过，局办公室的小吴倒是来过一回，却是来了解他几年前处理的一宗盗窃案，为的是要编公安史志用。别的电话倒响个不停，刚开始的几天，大叔积极地抓电话，但这些电话都不找他，都是打给我大婶和小姗的，大部分是打给小姗的，打给小姗的电话分布的还有规律，一般在周末或者晚上下班以后。小姗是我的堂妹，师专毕业后，在县城的中学做老师，小姗就抗议：“爸，以后你别接我电话了，像查户口似的，干什么这是啊。”我大婶冷笑：“哼，你爸呀，一来电话都以为找他的，等着发挥余热呢。”后来，大叔就不接电话了，虎着眼在边上看。

昨天晚上，小姗接了一个电话，兴冲冲地就要出门，大叔瞪起虎眼：“又要出去？！现在治安这么坏，你什么事白天出去不好？偏要晚上出去，啊？”“爸——”小姗不乐意了，“爸，现在的治安好极了，你没看县电视台的新闻么，县公安局进行人事改

革以来，近期社会治安明显好转。”“你别听你爸的，净是事儿，”我大婶说，“早去早回啊。”小姗穿着高跟鞋，“噤、噤、噤”地下楼梯走了。

“哼！我看小姗迟早要被你娇惯坏，什么治安明显好转啊，现在的治安能叫好转吗？啊，前几天东门大桥那儿还出了一起骑车抢夺案。”“阿唷，俞股长，你就省省吧，就你行，就你能耐，你能耐你来做饭，你连做饭都不会啊。”“噤！”大叔气往上涌，退休两个月来的不快，就像埋藏在地底的火山，都在昨天晚上爆发了。“崔美林，”他叫着我大婶的名字，“崔美林！啊？让你做饭都委屈了你？啊？”大叔伸出一张肥壮的手掌，“啪”的一声拍到茶几上，茶几上一只盛有半杯茶的精致茶杯，应声落到地板上，摔成八瓣。大婶手里正擎着只水杯，她抄起水杯把大叔浇了个透心凉。大婶年轻时在纺织厂工作，做过车间主任，也算是女中豪杰、巾帼英雄。这阵儿她只手叉腰，柳眉倒竖、杏眼圆睁，“俞得文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把我当作得武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和我耍威风，我什么时候怕过你。”大叔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，你厉、厉害，我服了你，我和你离、离婚。”我大婶把手一挥：“没门儿，俞得文，我告诉你，你想也不要想。”说完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进屋关上房门，连晚饭也不做了。大叔坐在沙发上，气哼哼地想了一阵，没有头绪，后来隔着房门对大婶说：“好，好，崔美林，我回乡下住，我看看这家要被你折腾个什么样？”所以昨晚就给二叔打了电话。

昨晚不知不觉地又在沙发上睡了一夜。今儿一早醒来，大叔发现身上多了条毛巾被，心想定是小姗回来时给盖上的。洗洗漱漱，觉得自己的肚子空空落落的。完了，大叔对着小姗的房门喊：“小姗，我去你二叔那儿，得待一阵子，在家照顾好自己。”

小姗的房间没有动静，大叔猜她一定还在梦乡。我大婶的房间倒出了回音，大婶说：“你有种，就别回来。”大叔想发作，忍住了，心里一阵恨恨，一阵酸酸，拎了一个小包悄悄地、有些颓废地出了门。

小区的对面是一个早点铺，卖“正宗武汉九龙包”，还有热腾腾的稀饭。大叔先过来吃早点。大叔不常上这儿吃早点，上班时是这样，退休后的早饭都是大婶料理好的，所以还是这样。大叔不认识开早点铺的人，开早点铺的人却认识我大叔，很热情地招待着：“俞股长，上班这么早。”他不知道大叔已经退休了。大叔的一丝颓废就消失了，吃完早点，浑身热乎乎的，仿佛时光倒流，回到了青年。上短途汽车站，上了开往松桂的个体班车，太阳就当空照了。现在从县城到松桂的公路早已是宽阔的柏油路。个体车的老板兼司机也认识大叔，个体车在路上不停地拉客。老板说：“俞股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耽误了你的行程，可是现在不这么干不行啊，养路费这么贵，油又涨了，关键是架不住你们公安局罚呀。”大叔说：“谁让你不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呢，你违反了规定，当然得挨罚了。”大叔的心情竟一下好起来了。客人上上下下，个体车走走停停，跑了个把小时就到松桂了。老板说什么也不肯要大叔的车费。大叔说：“那我就算腐败喽。”把钱揣兜内了，下了公路，向翠竹掩映间走来。

才半晌人已威风凛凛地在二叔眼前了。大叔长得又高又胖，虽然退休了，那警服穿在身上，依然笔挺笔挺的。“得武，你们干什么？”大叔问。二叔的周围立刻烟消云散，爬到树干上的兵兵也刺溜一下滑下来，撒腿如飞。在我的老家，我的大叔就有这么威风。

大叔说：“得武，你过的日子也蛮舒服的嘛，啊？我要的那间屋子收拾好了吗？”二叔就“嘿嘿嘿”地乐，“再舒服也不会有你舒服，那房间本来就是客房，我现在就去收拾。”大叔说：“哦。”大叔对杏树底下的躺椅感兴趣，拿脚轻轻地踢了踢椅腿，“得武，你别说，这家伙还真结实，啊，都用多少年了，你也别光站着呀，给我倒杯水吧，你看天这么热，你存心要把我渴死，暗害革命干部吗，啊？”“水还没烧呢，”二叔说，“我这就烧，我这就烧。”

这时候，屋子里的电话响了。二叔跑进屋，接起来一听，是小姗打来的。小姗问：“二叔，这两天没有出去表演呀？我爸到了吗？”二叔说：“这不正赶上农忙的时候吗？过一阵子才能出去，你爸到了，找你爸？”二叔就跑到门口喊：“哥，小姗的电话。”

中午，松桂村的村支书沙彦斌，村长胡德凯亲自来请大叔去村里喝酒。沙书记说：“俞股长，你是我们村的恩人啊，是吧，胡村长你说说，那回开关厂的被骗案，还有那谁家耕牛被盗的事，要不是俞股长关照，能那么及时破了吗？还有那回你儿子……”胡村长的脸就红了，说：“那是，那是，俞股长平时大忙人，也请不到，对了，也别落下得武哥，得武，一起去，一起去。”到吃饭的时候，一个副支书、两个副村长，还有民兵营长和妇联主任都来了，村里的几大班子领导作陪。酒酣耳热之际，又有饭局来了，乡派出所的黄所长找大叔找不着，把电话打到了沙书记的手机上。黄所长说：“老俞啊，不够意思嘛，回来也不告诉一声，手机还老关着。”大叔说：“手机那玩意儿，我早就不用了，你老黄也真神通广大啊，我刚回来你就知道了，今天就算了吧，要不，你也过来啊。”黄所长说：“中午就算了吧，那说好明晚啊，

明晚我做东，我派车去接你。”

回来这两天，就很快地过去了。第三天的晚上，二叔买回菜，做好饭，两个人吃罢，二叔收拾桌子。

大叔躺在房间里看电视，二叔提着壶热腾腾的开水推门进来，“哥，开水来了。”大叔“哦”了一声，就把电视的音量调小了，开始洗脸洗脚。窗外月凉如水，二叔问：“小姗现在去学校，还是每天骑自行车？”大叔哼了一声。二叔又接着问：“我嫂子还好吧？”大叔的心里就很不高兴，疑心上次小姗的电话，二叔向她打听了什么东西。大叔说：“得武，你也回去歇着吧，我没问你话，你问我什么！”

二叔嘀咕：怕是吃了火药吧，连问一问都不行。就不再言语，心里对大叔回来的原因倒也猜透了八九分。

二叔一直让着大叔。前年杏儿红的时候，二叔又和大叔结伴来我们这座城市。奶奶说，我们老家的红杏，那种甜，那种酸，在这边根本买不到，在这边卖的，能叫杏子吗？二叔就扛着一大包的杏，走几百米，来到公路边。从路边招手坐汽车到县城，又步履蹒跚地扛进火车站。大叔在火车站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大叔大手一挥，说：“赶紧上车，怎么才来呢？”二叔又气喘吁吁地把一大包的杏扛上火车。现在从县城到我们这座城市，早已有了直通的火车，夕发朝至。火车从黑夜走向黎明，早上五点二十就到了。然后两个人换公共汽车，二叔又扛着大包，大叔甩着两胳膊，穿着笔挺的制服领着走，就像警察领着劳改犯。后来上我们家的楼梯，二叔实在累得够戗，大叔才夺过包说：“得武，你现在这样没出息了，这一小包的东西，竟把你累成这样，啊？”把杏扛进我们家。我妈妈一见，埋怨起来：“得文、得武，啥时候

到，也不来个电话呢，我们也好去接。”

大叔对我奶奶说：“妈，你看这杏，我和得武给您捎来的，您尝尝。”说完脸不红、气不喘。一家人欢喜无限，二叔更是笑的使者。那么沉的一包杏，三天也没吃完，冰箱又放不下。我妈妈说：“真是的，捎这么多，看把得文和得武累的。其实，你看我们楼下那超市，什么都不缺呢。”“嫂子说得也在理儿，”二叔说，“你别看楼下那几间小门脸儿，你别看屋子不大点儿，服务员笑吟吟的暖心坎儿，有火机、有烟卷儿；有手电、灯泡、盘子、碗儿；有刀子、勺子、小饭铲儿；有梨儿、桃儿、杏儿，可怎及我们家这绿色食品儿。”我们一家人又乐得前仰后合。大叔却说：“得武这张嘴，我看也能治好，抓起来，关一年禁闭。”大叔虎着脸，二叔就不再言语，嘿嘿嘿地乐。“二弟说得挺好的。”我妈妈有点替二叔过意不去。我奶奶躺在沙发上，笑得泪花四溅：“得武啊，你要听得文的话；得文啊，你照顾得武啊。”

第四天，大叔因公务在身，坚持要走。本来二叔可以多住几天的，可大叔把眼瞪起来：“走吧，得武，过几天再走？成心要让老妈再哭一回，啊？”二叔就铁了心和大叔结伴走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妈妈嘱咐大叔：“以后别那么说二弟了，二弟也是五十多岁的人呢，二弟太老实了。”我妈妈的眼圈红红的。大叔说：“得武老实？嫂子，你不知道啊，鬼着呢。”下了楼梯，一行人来到街上，二叔突然飞起一脚，把一只矿泉水瓶踢得如离弦的箭。大叔说：“你们看，你们看，连脚都不老实。”

现在他们要住在一起了……

日子一天、两天地过去，树上的杏由青变黄，然后将会变成红杏，缀满枝头的。大叔回来热闹了两天，又复归于宁静。这日

子就好比后园那半亩方塘，除非你往里面投掷一块石头，才能激起些许水花，平时波澜不兴得让人乏味、心焦。大叔觉得老屋的蚊子似乎比四十多年前多了许多，关键是空气更污浊了，连屋瓦都有了霉味儿，在屋子里飘飘忽忽着。四十多年前，我们这幢老屋简直算作“豪宅”，全松桂也找不到第二家，它就像一只独立鸡群的孔雀，骄傲地俯视着周围一片低矮的茅草房。可是，十年河东，往日荣华不在了。四十年后，它的周围尽是一幢幢新式的楼房，老屋显得是那么的破败和寒酸。大叔住在里面，不由得想：这得武是真没出息。

二叔每天买菜、做饭，两个人吃罢，二叔又收拾桌子。这天晚饭时，大叔说：“得武，趁着现在还不算老，得琢磨些挣钱的道啊，也不枉来这世上一回，你一年到头，在外说书卖唱，能挣多少钱，啊？”二叔说：“嘿嘿嘿，这事，我还真没想过，再说又有什么好挣钱的道呢？”大叔说：“道有的是，你把西边那荒山承包下来种果树，我看就行，或者种樟树。”种樟树的确不错，村里沙书记三年前花二十元钱在门前栽了两棵樟树苗，当时不过拇指粗，现在有手臂粗了，就有人出每棵二百元的价钱要买走，沙书记不卖。二叔就有点动心。“哥，”二叔说，“那承包荒山又不是一人说了算，得找村领导商议。”大叔说：“咳！我现在给沙书记、胡村长打个电话不就得了，怎么样？树苗钱我帮你出一半。”二叔想想承包荒山种樟树也好。

怎么买树苗呀？怎么和村里签协议呀？树苗长成还得怎么守护？怎么销售？收入怎么分配？如此等等。前期工作该想到的都想到了，两个人商量到半夜，二叔说：“行！”意见就统一了。后来大叔又说：“得武，挣了钱，也该给房子换换了。妈还说有合适的女人家，帮你张罗一个呢，你说，现在哪有合适的女人肯进

你的门，啊？卖唱那活儿，趁早就洗手吧。”

二叔一听就不愿意了：“哥，我这叫说书。”“说书？”大叔纳闷儿，“说书和卖唱有什么区别，啊？”“说书和卖唱当然有区别，说书是一门艺术，你没看中央电视台还有一档评书、小品、相声、笑话、曲苑杂坛吗？”大叔听了就哈哈地乐，大叔说：“那是人家中央电视台，你能和人家比吗？你还不是卖唱的，啊？”“反正我就要做卖唱的，荒山我不承包，种樟树你自己种吧。”大叔说：“哎，不刚刚说好的事情吗？怎么转脸就反悔？你说这合作如何往下进行，啊？”

夜里躺在床上，大叔想，就是和得武合作，那一半的树苗钱恐怕也没地方出。家里崔美林是财政部长，把钱把得牢牢的，除了零花钱，就是买奖券也休想她多出两元。崔美林的脾气是什么时候变坏的？记得刚结婚以及婚后多少年都是挺贤惠的……都是那个杜艳平，在县城开桑拿酒店的，本来说好是逢场作戏，可她偏要弄成风风雨雨，桑拿酒店关闭了，杜艳平现在跑哪儿了……一只小老鼠窜到房梁上，把梁柱上的灰尘弄得扑簌簌往下掉，大叔想，这鬼地方……瞎想了一阵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第二天起来，二叔又去买菜、做饭，只是话少了许多，脸上冷冷的。大叔想起昨晚的事，也觉索然无趣。吃完早饭，又想起那天和黄所长喝酒时，老黄说他有一个亲戚想在县城开一个大酒店，“老俞啊，你退休了，就请你做经理，我也快到岁数了，过两年咱哥俩一起干”。怎么说完就音信全无的？想给黄所长打个电话问问，觉得是人家要请自己，自己送上门去问不好。不打电话吧，又担心老黄那事到底有没有个谱，不想让时光虚度。

大叔踌躇了一阵，还是抓起电话。黄所长一接电话就打哈哈：“老俞啊，怎么还没回去啊，又是被嫂子赶出来了，哈哈，

一定是的。”大叔说：“老黄你真损啊，我回老家来多住几天就不行啊。哎，上次喝酒时说的那事没准又老黄了吧……”黄所长说：“老俞，你真积极啊，这才说了几天啊，哎，倒是我说啊，听说贵府的杏子不错啊。”大叔说：“不错，你开车来摘几个走。”黄所长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小气了不是，哎，说正经儿的，过几天哪，我、还有刑大的老李、老覃，汪庄所的李所长来看你，你就开个‘赏杏会’，怎么样？啊？”

大叔的心情又好了起来。

长日漫漫，大叔想起要去钓钓鱼，去东湖那边施展施展拳脚。这东湖和武汉的东湖重名。大叔说：“得武，你这把鱼竿，太老式了，等我回城送你一把新的。”二叔就从鼻孔里“哼”了一声。大叔说：“过两天，有些老战友、老部下来看我，你在家，别让小孩把杏糟蹋了，啊。”大叔转到门口又说，“小孩都是人来疯，你给他笑脸，他就能骑到你头上，我在家他们为什么就不敢来？回头，我们煮鱼吃，啊。”说完就提着钓竿出门了。

二叔哼了几声，心里老大不愿意，心想得文怎么老是狗眼看人低。但还是把躺椅搬到杏树底下。把躺椅往外搬时，手碰到一面圆圆的鼓，那鼓发出“咚”的一声响，二叔听起来，雄浑而有力，又想：“得文怎么老是把说书说成卖唱的呢？说书虽然也唱，但和卖唱不是一回事，说书是一门艺术，光为了挣钱糊口是卖唱的，卖唱的有多少讲究唱腔什么的呢？”二叔不禁把圆圆的鼓敲得“咚咚”地响。

村庄的小家伙，闻到鼓声，好像听到进军的号角，围到二叔周围一层层。二叔唱：“曾记当年蒋介石，指挥了二十余万的反动军，包围边区陕甘宁……”“好前程，万紫红，遍地春，社会

主义啊，建设革命难忘创业的人……”二叔的声音让树上的杏儿弥漫起清香的气息，果香的气息在空气中流动，不远处那条柏油路上，行人稀少，闻着的人都驻足不前。

后来有一老一少两个人从柏油路上走下来，顺着当年弄脏了我新球鞋的小土路，来到我二叔跟前，两个人静悄悄地听了好一阵，年轻人禁不住喝彩：“好！好啊！老先生，您一定是位艺术家。”“艺术家”三个字让我二叔心里很舒服，温暖暖的阳光让他闭目陶醉了好一会儿。一抬眼，呀，来了两位陌生的客人，老的白发银丝、和蔼安详，年轻的文质彬彬、神采非凡。二叔说：“哎呀，艺术家我可不敢当，充其量是个说书的艺人。”“老先生吐字清晰、嗓音醇和。要说是个艺人，也是艺人中的艺人啊，哈哈……”年老的朗声笑着，“好杏树、好人家、好说唱，此处果然非凡。”又扭头对年轻的说，“小汪，从有关资料记载看，此处‘文革’期间闹得最凶，所有的果树都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，这么说，这两棵杏树也是‘文革’后才栽的喽，按理说此地二三十年的杏树能长这么粗吗？”“有八十年时间了，是我父亲小时候栽的，”我二叔说，“我父亲去世得早，他为政府做过贡献，我两个哥哥都是参加革命的，要不然，别说两棵杏树，当年搞运动连这后面的房子都要搞掉。”“难得，难得，”那个叫小汪的年轻人对二叔说，“老先生，您接着表演，您接着表演。”

年老的点头赞许。

这天的日子很特别，有一种得遇知音的感觉在我二叔心里萌动。“梨未熟，杏已黄，客人千里来我家。请尝杏，请喝茶，请听歌，听我唱支木鱼歌，”我二叔潇洒地把手一挥，村庄里的小家伙热情似火，这天又是星期日，几个上小学的半大小伙子嗖嗖地蹿上我们老家那两棵杏树。二叔青春焕发，沏茶打鼓滴溜转：

“开书先说‘木鱼’头，太平景象永无忧。银树开花添锦绣，金枝发叶色光涂。今年丰熟方方有，老少平安添福寿，一路光明到白头。景地太平无贼寇，村乡平靖无人偷。买卖营生到处有，任你打开门睡放得银牛。”

两客人也来了兴，跟着呕呀作歌。

末了，年老的问：“听老先生刚才唱‘开书先说木鱼头，莫不是木鱼歌吧？木鱼歌，不是应该敲打木鱼的吗？怎么老先生你敲的是鼓？”“老先生，你不知道，”我二叔说，“木鱼歌，不但敲的有鼓，还有小锣呢！”“长见识，长见识。还有一事，老先生，据我所知，木鱼歌流行于粤地，怎么此地也唱木鱼歌？”“咳！老先生，跟你讲，流行全靠脚底板，说书艺人一唱歌，天下流行木鱼歌。”“有道理，有道理，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，这是意外的收获，小汪，你把刚才老先生的话记下来，要全部记下来。”

太阳还悬在中天，大叔已经往回走了，怒气冲冲的。身后一只塑料桶吊在鱼竿上，空荡荡的像在荡秋千。早上往东湖走时，碰到乡里的民警老吴。这个老吴也是个没有出息的主，就甘心在黄所长手下混自在日子，干了几十年的警察，现在连个副所都没有混上。老吴跟他打招呼：“俞股长，这么有闲，竟去钓鱼啦？”大叔说：“你才去上班啊，都几点了？等老黄见着，你这个月的奖金非黄了不可。”老吴就叫屈：“哎哟，俞股长，亏得没在你手下干活，要不然，老百姓的日子还有办法过吗？也不怕告诉你，黄所长去县城了，局长的命令。”大叔说：“那不对啊，我刚刚和他通过电话。”老吴说：“那不对了吗，他刚刚走的，我这是刚刚下班。”大叔哼哼哈哈了几句，从黄所长想到自己身上，觉得退休了就是不一样，别说局长不找了，连新股长的影子都见不着，这就叫人走茶凉啊，心里很不舒服。

来到湖边，选好位置，穿饵、伸竿，许久浮子动了一下，又猛地往下坠。大叔急忙提竿，一看，却是一条寸把长的小鱼。太阳耀眼，照射得人火气腾腾。后来还钓了几条，都是寸把长的，大叔一气，连先前钓的那一条都一遭抛进湖里了。“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这湖还叫湖吗？”大叔想，“搁几十年前，一变天，王八都往家里爬。”大叔就怒气冲冲地往回走。

还没到家，往门前一看，门前地上杏核狼藉，一阵风过，把地上的落叶吹得滚过来、滚过去。现在客人都走了，“艺术家”三个字留在我二叔的心上了，他舒舒服服地躺在躺椅上，晕乎乎像条喝了酒的鱼。

“得武！你混账！”大叔暴跳如雷。他一扬鱼竿，那只空桶飞起来，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重重地弹到我二叔身上，又滚落下去，滚落得老远。大叔早年在部队，投弹一流，得过标兵的称号。

“得文打我了！”二叔第一个念头就是：“得文动手打我了，士可杀不可辱，得文凭什么打我？”二叔就起身坐起来，二叔问：“哥，几十年我都让着你，让到你来打我了？”大叔说：“咦？你都不敢跟我顶嘴了，啊？你这不是连我都不怕了吗？”“我为什么要怕你？”这句话多少年来一直在二叔的嘴里徘徊，它仿佛是一口堵在嗓子眼的痰，不吐不快，一旦吐出，二叔觉得无比的酣畅，“你是人，我为什么要怕人呀，我怕身上生虱子，怕晚上饿蚊子，我怕你，你又不是虱子、蚊子。”“你，你，好你个得武，你等着，我看只有把你关起来，关你禁闭！”“算了吧，”二叔冷笑着，“好汉莫提当年勇，就即使那股长的位子你还坐着，你有什么资格就把我关禁闭？朗朗乾坤，难道国法是你定的？”“你，你，你，好你个破卖唱的……”大叔气得浑身哆嗦，“你马上给我滚，给我滚……”